发展集体经济对村庄治理影响的研究综述

曹昕宇[1],田东林[2*] (1.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 650201;2. 云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云南昆明 650201)

摘要 自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治理有效"这一目标,如何实现"有效治理"引起了学术界对村庄治理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路径之一,现有研究主要从产权结构、管理机制和治理绩效三个方面入手,分别分析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路径。归纳梳理已有研究,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 集体经济;村庄治理;产权结构;管理机制;治理绩效
中图分类号 F32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2)09-0009-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2.09.00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 Summary of Researches on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ing Collective Economy on Village Governance

CAO Xin-yu[1], TIAN Dong-li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01;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01)

Abstract Since the goal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was proposed 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concern on the issue of village gover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 is one of the ways to achieve effective village governanc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start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analyzes its influence path on village governance respectively. Summarize and sort 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Collective economy; Village governance;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Management mechanism; Governance performance

村庄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成果关系着广大农民的利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在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适应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国村庄治理所面临的新的挑战。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之一,而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路径之一就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近年,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村庄治理这一重要议题也走进了公众视野,发展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学者研究发展集体经济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主要从集体经济产权结构、管理制度、治理绩效三方面来进行。笔者对已有研究进行归纳梳理,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借鉴。

1 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的相互关系

近年来,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集体经济发展对村庄治理所起的作用是正向的,并且能够提升村庄治理的组织化和民主化。O'Brien[1]认为,经济相对富裕的村庄在进行村选举和行使农民自治方面更为成功,通过对在中国的调研结果研究,发现在村集体活动较多并且经济相对富裕的示范村中,出现了更多符合标准的村组织。肖龙等[2]认为,村庄治理过程中,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没有或无法申请到国家项目资助的村集体,集体经济这种内源性力量是获取公共财政支持的路径之一。何包钢[3]提出,在经济条件好的村庄中,村委会职务更具有吸引力,村民选举也更为激烈,并且在选举结束后,村委会的后续工作能更好开展。而在经济条件不好的村庄,由于资源的缺乏,后续工作开展很难,村委会的职务对于村民来说更多是一种责任。贺雪峰等[4]进一步研究发现,分配式村级治理在处理村中公共事务时,将如何从农民手中汲取人财物等资源作为关注重点,在动员型村级治理中,假设某项公共设施的建设一次性获得村民的一致通过,村民也可以从其中获得好处,则在下一次公共决策时,就更容易通过。反之,则更难通过。胡荣[5]明确指出,村级经济发展越高,村级选举竞争越激烈,村民参与度越高,越能鼓励选举制度的实施。

第二种观点认为,集体经济发展与村庄治理有效性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现为倒 U 型曲线。Epstein[6]在研究中以省为单位,发现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反而是处于中等水平。Shi[7]认为,经济发展与村级选举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凹曲线,村民半竞争性选举的概率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减弱。Oi 等[8]指出,在富裕的村庄,村干部为了在这个岗位上获取更多的利益,会去阻碍村庄选举或是抑制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治理,导致在富裕的村庄,进行差额选举的可能性更低。孙秀林[9]在对 400 个村庄调查后发现,农户个人人均纯收入对村庄的民主程度影响不大,而村内集体收入和非农收入对村庄的民主程度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达到极值后会开始下降。

第三种观点认为,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是负相关的关系。相较于富裕村,贫困村具有推动村庄治理的强大力量,正是因为村庄经济发展落后,村庄的公共事务难以推进,才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方式[10]。根据具有较高工业化水平的发展经验可知,经济发展与村庄民主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呈显著负相关,在资源丰富的村庄,村干部拥有非农资源的处置权,

基金项目 2019 年云南农业大学重点学科培育学科建设项目(2019-YNAUXJPY05);2019 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项目(AC19003);2020 年云南农业大学第十四届学生科技创新创业行动基金项目(2021RSX016)。
作者简介 曹昕宇(1998—),女,云南禄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管理。*通信作者,教授,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收稿日期 2021-08-19;**修回日期** 2021-09-13

因此可以有渠道获得对应的潜在收益,如在村庄内建立监督制度会阻碍村干部获取额外收益,因此村干部对监督制度的建立可能会持反对意见,导致村民无法充分享受村集体资源的收益[11]。

2 集体经济产权结构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结构是村庄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此部分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角度出发,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角度进行审视,重点关注集体产权单元和治理单元的对称性对村庄治理秩序的影响以及产权的集中性与稳定性对村民关系和权利结构的影响。

陈荣卓等[12]认为,产权不明晰和权责不明容易导致农村行政管理缺乏合理有效的产权支撑。邓大才[13]认为,产权和治理之间的联结可以以单位为媒介,也可以通过单位来考察,产权的运作和治理的实现都需要通过单位来实现,因此,单位在产权与治理的关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并且决定着产权与治理的绩效。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黄振华等[14]的支持,我国目前在行政村设立农村自治单位,导致产权单位和自治单位相互剥离,村民自治的治理绩效被削弱;如果产权单位与自治单位一致,产权可以调动治理的内在动力,提高农户自治的治理绩效。仝志辉等[15]也认为,集体经济产权与村庄治理的关系密切,明晰产权可以激发农村各要素潜能,激发农村主体的活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体现在治理主体效应、治理资源效应和治理体制机制效应上。刘志秀等[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集体产权与村庄治理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村庄治理的发展对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具有推动作用,反之,集体产权改革也可以促使村庄治理向更深层次变革。项继权[17]研究发现,农村社区的产权结构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新集体主义”模式具有更高的治理水平和农民参与度。

3 集体经济管理机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村集体权利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式由集体经济的工作管理方式和集体产权结构决定,由此产生不同的权利结构和治理方式,对农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也不相同[18]。

蒋红军等[19]研究认为,通过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土地权属和成员资格进行界定,可以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产权和资格,促进村庄治理中的权利和责任的整合,促进农村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优化,充分处理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张茜[20]认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的权利、责任,以及利益的分配,将产权和股权确权后量化到个人,拓宽和加强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利益联系,同时减少了农村基层的利益冲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一方面,具有股份合作制股东身份的集体成员,会更加关心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另一方面,可通过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落实集体经济管理责任,规范和平衡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各种利益分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多个治理主体关系的资源共享信息平台,提升多个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能力。

股份合作制是在农村集体经济实践中所形成的一项制度安排,吸引了广大学者的探讨,该研究从股份合作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进行梳理。对于股份经济合作制的作用发挥,学者们做了深度研究,余伟基[21]认为,农村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推动器,通过土地统筹规划,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形成规模经济,明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梁燕雯[22]认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产权清晰,将产权功能与经营权功能相分离,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同时增强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生命力。黄连贵[23]认为,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丰富了农村股份合作的内容,更新和发展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二是加快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三是产权明晰,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四是村社决策科学民主,行政透明。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肯定了农村股份合作制制度在村庄治理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4 集体经济治理绩效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公共品供给水平是衡量村庄治理的重要标准,也是村庄治理的核心内容。中国农村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政府始终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者[24]。并且政府在村级公共品供给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过大是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25]。La Porta 等[26]指出,政府绩效应该由教育供给、婴儿死亡率、识字率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评估来衡量。近年来,中国在农村公共产品投入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仍存在着较多难题。例如,公共品供给不足[27]、供给结构失调[28]、供给效率低下[29]等问题在我国普遍存在。而公共品的提供者为政府,基层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就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扩大经济来源,村集体要扩大经济来源,发展集体经济是有效路径之一。魏建[30]将公共产品分为政治公共产品和经济公共产品,发现在经济发展有限的村庄,政治公共产品的作用不大,经济公共产品在贫困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村民自治供给,阻碍村庄的发展。在影响公共品供给水平的众多因素中,村庄民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因素。民主化发展加剧了精英群体的内部分化,从而使只惠及个别利益群体的政策难以获得批准,而会考虑加大基础性公共品的供给[31]。并且 Luo 等[32]研究发现,公共财产投资与村干部改选呈正相关关系,当村干部愿意连任时,就会加大对村庄公共财产的投入。王淑娜等[33]经过对 8 个省 48 个村的考察调研,得出村级民主选举可以提高公共支出在村级预算中的比重的结论。王海员等[34]的研究表明,村级民主对公共产品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与村集体经济水平关系密切,公共品的投入会随着村集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要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对教育、医疗等民生类公共品的财政投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35],另一方面也要摆脱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形成农民和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品的多元供给格局[36],尤其要发挥民主的民生绩效,给予农民更多的参与权和决策权[25],才能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升村庄的治理水平。

5　结语

研究发现,农村集体经济主要通过三方面对村庄治理产生影响,主要是产权结构、管理体制和治理绩效,发展集体经济有望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村庄有效治理的路径之一。

首先,从总体上看,发展集体经济具有保障农民权益和改善村庄治理的两大作用。在产权结构方面,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后,加强了农民与集体的经济联系,鼓励农民积极有效地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处理,有利于重塑新的农村共同体;在管理机制上,集体经济的运行和管理的方式,对村集体资源配置和利用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权利结构和治理方式。大多数学者都肯定了集体经济管理机制在村庄治理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治理绩效上看,当以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为衡量指标时,已确定村级民主对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会随着村集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其次,乡村治理研究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过程因素关注较少。"民主选举"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西方价值判断,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治理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理论模型的构建,缺乏对农村治理的实际操作及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应该尝试从更多具有中国地方性和特色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乡村治理,探索乡村治理机制。

第三,目前的研究很少关注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结构,往往从产权和资源的角度出发,忽视了社会环境、农村文化、集体经济经营主体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应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结构,以推动村庄治理建设。

参考文献

[1] O'BRIEN K J.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4,32:33-59.

[2] 肖龙,马超峰. 从项目嵌入到组织社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类型学研究[J]. 求实,2020(3):69-83.

[3] 何包钢. 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村民选举的? [C]//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01:17.

[4] 贺雪峰,何包钢.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型: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2002(6):46-52,81.

[5] 胡荣. 经济发展与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J]. 社会,2005(3):27-49.

[6] EPSTEIN A B.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Experimenting with democracy [M]//China's economic future:Challenges to U. S. policy. Washington, D. C. :U. S. 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1996:403-421.

[7] SHI T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9,8(22):425-442.

[8] OI J C,ROZELLE S. Elections and power: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J]. The China quarterly,2000,162:513-539.

[9] 孙秀林. 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8(6):80-107,244.

[10] LAWRENCE S V. Democracy,Chinese style[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4,32:61-68.

[11] OI J C. Economic development,stability and democratic village self-governance[M]//BROSSEAU M,PEPPER S,SHU-KI T. China review.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6.

[12] 陈荣卓,刘亚楠.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腐败治理机制建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76-81,152.

[13] 邓大才. 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关联性研究:基于中国农村治理的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2015(7):43-64,206.

[14] 黄振华,张会芬. 农村产权单元与自治单元的关联性及其治理效能:基于全国25个省(区、市)296个村庄的实证分析[J]. 宁夏社会科学,2018(1):129-134.

[15] 仝志辉,韦潇竹. 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解乡村治理:文献评述与研究建议[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48-158.

[16] 刘志秀,李增元. 乡村振兴中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J县A社区的实证研究[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1):33-51.

[17] 项继权. 乡村集体化与民主化:若干乡村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1999(2):55-60.

[18] 袁方成. 治理集体产权: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政府与农民[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2(2):1-17.

[19] 蒋红军,肖滨. 重构乡村治理创新的经济基础:广东农村产权改革的一个理论解释[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3-21.

[20] 张茜. "高水平集体化"方向的一种初步尝试:山东省东平县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5):48-53.

[21] 余伟基. 农村城镇化的载体:农村股份合作制[J]. 南方农村,2003(3):40-42.

[22] 梁燕雯. 城郊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缺陷及创新思路[J]. 城市发展研究,2008(3):62-67.

[23] 黄连贵. 当前农村股份合作新发展[J]. 农村经营管理,2005(8):11-14.

[24] 白南生. 农村改革三十年的政策梳理:评《崛起与超越: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及机理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09(4):111-112.

[25] 田孟. 发挥民主的民生绩效: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2019(7):109-124.

[26] LA PORTA R,DE SILANES F L,SHLEIFER A,et al.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1999,15(1):222-279.

[27] 李燕凌.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求均衡路径分析及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7):59-65.

[28] 柳庆刚,姚洋. 地方政府竞争和结构失衡[J]. 世界经济,2012,35(12):3-22.

[29] 冷哲,黄佳民,仲昭朋.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区域差异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6(5):80-91.

[30] 魏建. 两种公共产品的供给与中国农村的发展[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6):69-74.

[31] LIZZERI A,PERSICO N. Why did the elites extend the suffrage? Democracy and the scope of government,with an application to britain's "Age of Refor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4,119(2):707-765.

[32] LUO R F,ZHANG L X,HUANG J K,et al. Village elections,public goods investments and pork barrel politics,Chinese-style[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46(4):662-684.

[33] 王淑娜,姚洋. 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2):121-130.

[34] 王海员,陈东平. 村庄民主化治理与农村公共品供给[J]. 中国农村经济,2012(6):72-84,96.

[35] 颜燕,王蒙,张杰. 土地财政是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的真正推手吗?[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46-157.

[36] 张鹏.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供给制度的构建[J]. 理论与改革,2009(5):68-71.